

澳華新文苑

第1191期 (B)

嚴歌苓的“得天獨厚” ——她文革時期的童年心影與“局外人”的“雙重視角”

何與懷

今天，嚴歌苓取得的成造之所以取得，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之所以發生，是順理成章的。

1989年這一年，對嚴歌苓來說，是命運的分水嶺。

她去了美國留學，丈夫李克威也是去留學，但卻是另赴澳大利亞。同年，他們離了婚。他們是1986年認識的。那年的那一天，嚴歌苓在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寫作樓邂逅李克威。李父是著名作家李准，母親是電影《李雙雙》裡改名董冰的“李雙雙”原型董雙。早在1979年，年紀輕輕的李克威就以他的電影文學劇本《女賊》驚動中共文化領導官員，並和其他爭議作家作品如《假如我是真的》和《在社會的檔案裡》一起被當作“樣板”在整個中國文壇上引起了關於文學“社會效果”的大辯論。門當戶對與相同的寫作背景使得兩人很快相戀並於同年結婚。但結果這一段婚姻只維持了三年。而嚴歌苓在美國艱難的學習兼打工期間，經朋友介紹認識了一位美國外交官勞倫斯·沃克先生，於是有了另一段不平常的愛情，並讓她走上另一條生活軌跡。

戀愛期間，嚴歌苓被美國FBI審查、測謊，之後美國外交部還是要勞倫斯作出選擇：要麼離職，要麼結婚。勞倫斯在前途無量的外交官生涯與嚴歌苓之間，毅然放棄了前者。1992年秋天，嚴歌苓和勞倫斯在舊金山結了婚。2004年，放棄外交官生涯達十一年之久的勞倫斯被“召回”復職，嚴歌苓做起了跟著世界到處跑的專職的外交官夫人。三十多年來，婚後的嚴歌苓心裡有了一種永恆的安穩，生活非常幸福，多年在美國居住和在世界各地游歷的生活讓嚴歌苓感情深沉，知識廣博，藝術觀念新穎，擁有寬闊多元的文化視野，寫作也進入佳境，成為年年都出版作品的高產作家，成為中國以及台灣的“獲獎專業戶”，並以其文學業績引起國際文學界矚目。面對圍觀者的驚嘆，她很淡然，說：“我不寫怎麼辦呢？我讀書的時間也留出來了，做飯的時間也留出來了，我精力大概太旺盛了吧。”

正是在美國，經過一些自由生活後，嚴歌苓在很多觀念上進一步發生嬗變，表現出巨大的開放性。作為一個作家，特別有意義的是她在“文化認同”（身份）觀念上的開放性。這發生在她自己的身上，進而也發生在她筆下的一些人物身上。如一位論者指出，她作品中的人物“身份”實際包含著三種屬性，即厚重、本源的“中國”背景；強勢、鮮活的“美國”背景和混雜、新生的異質背景。這三種屬性的共同存在，一方面使嚴歌苓的作品消解了因對“文化認同”的本質主義追求而引發的東—西、中—外文化的二元對立，另一方面也為她在多元文化

的對接中揭示人性的複雜性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舞台。而更為重要的則是，嚴歌苓在她作品中這些人物身上，實際上已經重建了一種新的“文化認同”，這些人物已經具有了世界性的“人”的身份。一種變化的、相對主義的、新的、全球性的“文化認同”觀念已經誕生。在某種程度上講，正是這種新的“文化身份”觀的建立，使嚴歌苓的小說創作在世界華文文學中獨樹一幟，別出新局。

許多文化理論家對世界上離開自己家鄉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作家做了不少深入的研究。他們發現，這些作家具有一種“局外人”的“雙重視角”，所以會在不同觀念、經驗的並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關如何思考的看法。其實，所謂“局外人”並不代表處於“局外”，在一定角度上，“局外人”甚至比“局內人”還要接近於“局內”，因為局外人畢竟多了一層參照系，而這就是文化理論家所強調的“雙重視角”。而嚴歌苓就是這樣一種“局外人”。她作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年赴美新移民作家，無疑具有了這種“局外人”的“雙重視角”。如許多論者所發現，嚴歌苓在移民美國後，開始跳出東方人的眼光來審視東方人的倫理問題，敘述與被敘述之間充滿了解釋的張力，這種地理與文化的距離有助於理性的審視，從而超越主觀的體驗。

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嚴歌苓覺得移民也是最懷舊的人。此種懷舊使故國發生的一切往事，即使有些或顯或隱，都顯示出一種特殊的情感價值。它使政治理想的鬥爭，無論多血腥，都成為遙遠的一種氛圍，一種特定的環境，有時特別荒誕，有時卻很凄美。我覺得，具有“局外人”的“雙重視角”嚴歌苓，必然發現她文革時期的童年心影，對她的文學創作起著相當重大的影響。

許多年前，嚴歌苓曾在短文《寫稿佬手記》中調侃她成為作家的原因：“據說有三個因素導致一個小說家的成功。當然，天分除外。一是父母離異（或早喪），二是家道中落，三是先天體弱。……正要不要，突然意識到自己倒恰巧具備這三個因素。成功還沒影子，三種不幸卻始終鞍前馬後跟著我，與我熟得不能再熟……像別的父母習慣於哭鬧的孩子一樣，我習慣了哭鬧的父母。”這是調侃式的探討，似乎不具普遍意義，但就嚴歌苓個案來說，童年時家庭以及息息相關的社會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她不幸的童年時期正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國進入文革這一場中華民族大劫難。（未完）

（2024年7月28日完稿於悉尼，為筆者長文《嚴歌苓：一位具有標杆性的文學人物》中的第五節，標題新設。）



嚴歌苓、勞倫斯·沃克一家。



嚴歌苓父親蕭馬和繼母俞萍（本文作者攝，2005年3月29日）

（接上期）三反發展到五反，革命大拳砸到私營工商業者頭上。上海灘上，

資本家惶惶不可終日，每天都有老板從高樓上往下跳，死了幾百個。市長就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連那個小書店老板也匆匆關店逃去鄉下。不知不覺中，阿慶又在夜裡為那些倒霉的老板們祈禱“阿彌陀佛！”

後來再後來，一場場紅色運動不斷，直至登峰造極。

玉佛的哭泣

沈志敏

“反到底”畢竟是反到底，小頭頭終於想出奇招，說是從一部電影“雲霧山中”裡學來的，解放軍打土匪，用一個鐵爪爬上懸崖峭壁。小頭頭連夜讓人制作了一個五指鐵爪，繫上繩子，他伸手練到下半夜。

第四天，呼啦一下，不偏不移，鐵爪飛上高牆，眾小將為頭頭喝彩。誰能爬上去呢？小頭頭當仁不讓，他嘴裡還念叨著，“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血可流，腿可斷，也要攻下這個頑固的封建堡壘。”

他爬至大半牆高，那鐵爪抓著幾片碎瓦一鬆動就掉下來，摔在地上的小頭頭痛得哇哇叫。送進醫院，果真是摔斷一條腿。

後來有人說，這是和尚爬在牆內，把鐵爪弄鬆了扔出來，也有人戲言說是菩薩的報復。阿慶叔說：“玉佛寺圍牆繞一圈這麼大，裡面的和尚也要爬到這麼高，還要恰好和外面的人爬在一條線上，不可能。怪菩薩就更沒有道理，錯在小赤佬把佛寺當土匪山洞，鐵爪翻牆，‘腿可斷’云云，自咒自果，這叫因果報應。”

我認為阿慶叔分析得在理。阿慶叔又說，廟裡有和尚傳話出來，那些日子看到玉佛的臉上有眼淚流出，菩薩慈悲。

文革大潮退去，社會恢復正常，玉佛寺的香火卻越燒越旺。

四

一晃半個多世紀過去，和當初阿慶叔自帶香燭踏進玉佛寺拜佛的行情大不一樣。

玉佛寺門票20元。觀摩玉佛，請一瓶香油祈福60元，過年香火券100元。廟內還開設餐飲和各種香火禮品買賣，當然這都是小錢，香客的捐款才是大錢。不過如今各家廟堂，財源滾滾，並非謊語。因為廟樓要大修，兩尊玉佛現居後院的一排殿堂裡，殿堂的壁牆上還掛著著一大排鏡框，其中都是近年來政府大員拜訪這裡的裡的照片題詞等，由此身價水漲船高。

那天朋友請我去功德林吃素餐，來了一輛鏗亮的奔馳車。司機是朋友的朋友，他不是車主，說老板今天不用車，出外快，我讓朋友享用一下。飯桌上品嘗著素什錦，司機神秘兮兮地透露道，他的老板是玉佛寺的“大神”。他還告訴我們，有一次送老板去河南參加一個佛教大會，進入寺院的豪華車數不勝數，猶如奔馳寶馬奧迪大展銷，還來了兩輛勞斯萊斯，最誇張的是一輛法拉利跑車，下車的大神後面還跟著一位花枝招展的女秘書。聽後大家哈哈一笑。

司機說的大神到底是誰？當然不可能是菩薩，是廟裡的法師方丈還是某位行政幹部或書記？有的廟裡據說已評出科級法師，處級方丈。如今不少廟裡除了和尚，還有其他工作人員，又設黨支部。平時念阿彌陀佛，七月一日唱紅歌頌黨恩，“我把黨來比母親，”感恩黨給佛教事業帶來的發展。

我又去看望阿慶叔，說起世道見聞，他頗感不滿地說，“走邪了，走邪了。佛在人間是普渡眾生，不是賺錢發財。以前聽說過玉佛流淚，現在廟堂雖然財源滾滾而來，人世間邪風也隨之吹來，亂像叢生，玉佛觀之，不知該笑還是該哭？”

他又提出兩個觀點：“一，佛來人間數千年，那時候也沒有這個黨那個黨的，一朝朝的皇帝老子都翹辮子了（滬語指死），佛教仍在天下人間。二，佛教在世界各國建廟修寺，講佛傳道。各國黨政不同，政見時有變化，何來佛感黨恩一說？謬哉，當年文革小將火燒廟宇，又算誰家恩賜？”

我笑道：“阿慶叔已經進入講佛理的高層次。”

阿慶叔現已九十八歲高齡，快成百歲人瑞，說話仍然中氣十足，頭腦清醒，往事歷歷在目，每天在家燒香拜佛。

（本文榮獲第14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

三

一九六六年，老人家毛主席穿上軍裝，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大手一揮，青年少年都吃上了文化大革命的興奮劑，一夜之間都變成小將。人到中年的阿慶叔卻天天關注著離家門不遠的玉佛寺。

一個“反到底”（其意為反對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一反到底）的紅衛兵組織戰鬥隊都由十五六歲的中學生組成，二三十人佩戴著紅袖章，有的頭戴軍帽，有的穿著不知從哪兒弄來的舊軍裝，這群紅色的愣頭青大呼小叫蜂擁而至。玉佛寺裡的和尚也天天看報，對當前的形勢早有所聞，一天到晚都把廟門關得死死的。

紅衛兵小將敲門不開，又拿來棍棒砸門，無奈那廟門太厚，小小棍棒敲擊，猶如蚊子給大象抓癢癢。有人提議爬窗。爬上去一看，高高的窗戶裡面釘得像一堵牆，爬上爬下更不方便。小將突發奇想，古代打仗，許多人抱著一根大木頭能撞開城門。不過這根大木頭，恐怕找遍上海灘也難以找到。有人就說：烏魯木齊路上的梧桐樹最粗，砍下一棵。但幾裡地如何拖到安遠路上來？

“拆那娘著逼（滬語下流話），拿你家菜刀，就能砍大樹？”紅衛兵小頭頭發瘋，表示今天沒戲了，大家只能鳴金收兵。

不過小將還是小將，第二天，大樹沒有砍來，卻捧來一堆樹枝散葉，放在牆根下，說要點燃熊熊革命烈火把這座封建大廟燒掉。剛起煙，附近的居民就提著水桶趕來，澆滅點點火星，質問道：“這邊大廟燒起來，燒到隔壁居民住房，誰負責？”阿慶叔更是怒火中燒：“小赤佬，你們是紅衛兵鬧革命，還是日本鬼子燒房子？”

這一問，小將傻眼了，紅衛兵的任務是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是打倒廟裡的封建菩薩，怎麼自己就成日本鬼子了？有人提議去弄幾包炸藥，把圍牆炸開。這玩意兒不好弄，誰也沒有玩過，第二次鳴金收兵。

第三天繼續革命，有兩位小將扛來了家裡爬閣樓的梯子，可是兩架梯子綁在一起不及半牆高。古代攻城用的叫雲梯，上海灘上哪裡去找雲梯？小頭頭眼珠子一轉，有了。他帶領戰鬥隊來到附近的救火會，說借你們救火車一用，車上的梯子豎起來可做雲梯，肯定能爬上玉佛寺的高牆。這是我們紅衛兵給你們消防隊員送來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大好機會。

紅衛兵要燒玉佛寺的傳聞早已傳開。消防隊裡仍有規章制度，隊長回答：“我們是救火隊，不是戰鬥隊。只能救火，不能放火。”

小頭頭也聽出話裡有話，就說：“今天不點火，就是爬牆進去，砸爛封資修。”

隊長斬釘截鐵地說：“上級有規定，救火車只能在救火時用，任何時候不能駛出去做為它用。”

“什麼它用？這是為革命所用，為戰勝封建菩薩而用。你們到底支持不支持我們反到底戰鬥兵團？”小頭頭要和救火隊長展開革命大辯論。

隊長說：“假如救火車在為你們翻牆砸菩薩，恰好你家裡著火了怎麼辦？”

小頭頭瞪著白眼無語，第三次鳴金收兵。